

会通与互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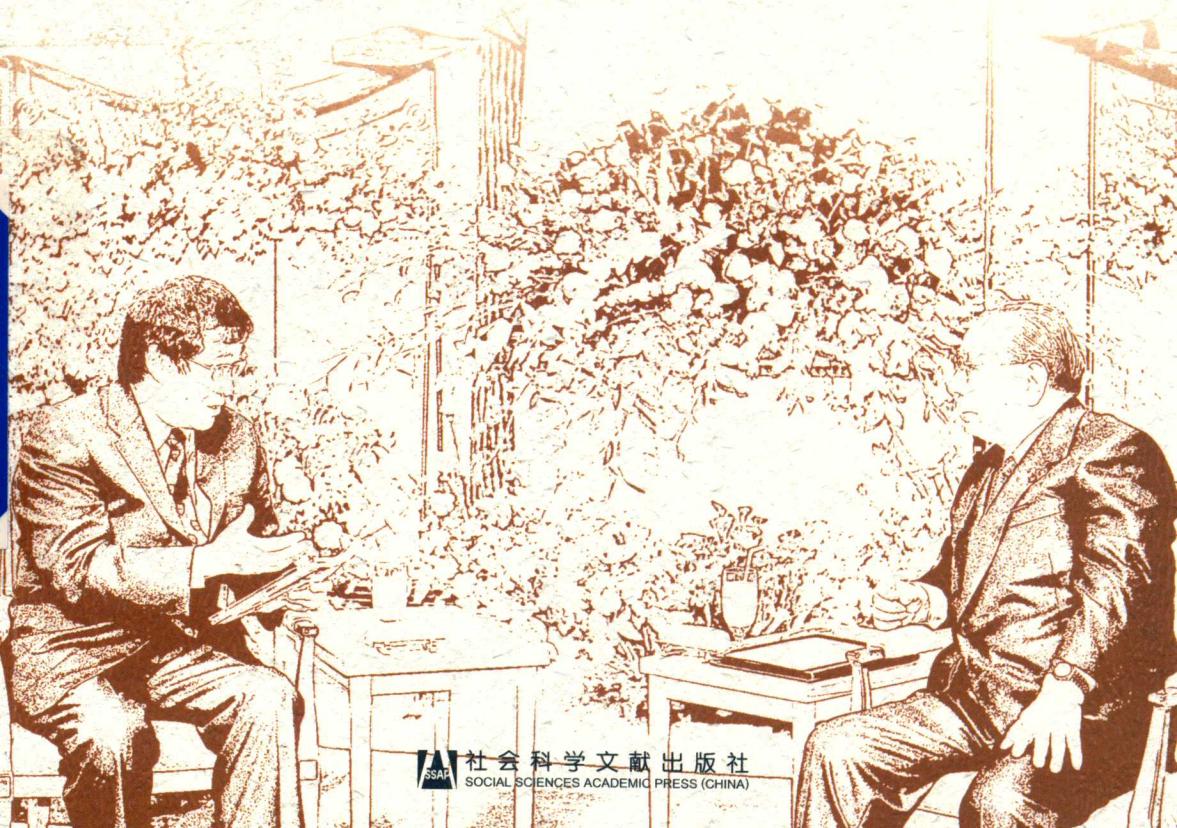
——池田大作文明对话思想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宗教学研究博士文库

陶金十一著

所谓和平，是相互之间不施加任何恐怖于对方，
相互衷心信赖、相互爱护的一种状态。

这样的和平状态应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也唯有如此，才能称之为人类社会。



会通与互鉴

——池田大作文明对话思想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宗教学研究博士文库

陶金——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SAP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会通与互鉴：池田大作文明对话思想研究 / 陶金著

·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6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宗教学研究博士文库)

ISBN 978-7-5201-4519-0

I. ①会… II. ①陶… III. ①池田大作(1928-) - 思
想评论 IV. ①K833.13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48537 号

·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宗教学研究博士文库 ·
会通与互鉴

——池田大作文明对话思想研究

著 者 / 陶 金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 任 编 辑 / 孙美子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 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 编：100029

网 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8 字 数：277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4519-0

定 价 / 9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的出版受到“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
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助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宗教学研究博士文库

学术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主 编 刘成有

学术委员会 方立天 刘成有 张 践 张志刚

金 泽 金宜久 班班多杰 龚学增

编辑委员会 孙悟湖 杨桂萍 宝贵贞 宫玉宽

游 斌 谢爱华 谢路军 韩思艺

总 序

中央民族大学进入“985二期工程”以来，“当代重大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心”实施了十大项目课题。民族宗教学作为一门民族学与宗教学相交叉的新学科的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理论框架探索方面，初步构建起学科的学理体系，包括确立它的研究对象、范围、方法，阐释它的主要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说明它的主要议题及思路。在历史经验总结方面，初步总结了建国以来的民族宗教工作的历程与经验，和民族宗教问题上的宁夏经验、云南经验、甘肃经验。在田野调查开展方面，围绕民族与宗教、宗教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资料，提炼出一系列新议题新见解。中心还实施了基督教中国化研究、藏传佛教文化研究、国际政治中的民族宗教问题研究。根据工程的要求，中心在实施上述课题时，把几届在读博士生组织到课题组中，在教师指导下参与课题的调查与研究，使课题实施与论文写作结合起来，于是形成一大批具有较高水准的博士学位论文。这些论文不仅丰富了中心的项目课题研究成果，也体现了中央民族大学宗教学专业在民族宗教学教学科研上的学科特色和优势。为了向社会展示这些博士学位论文的精彩内容，使之早日进入社会学术信息交流渠道，发挥它们促进社会和谐、推动学术文化繁荣的作用，中心决定设立“民族宗教学研究博士文库”，成立文库学术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按照一定的申报、送审、评定程序，把已经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并经过修订、达到出版水平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纳入文库，并从“985二期工程”经费中拨款给予资助。收入文库的部分博士学位论文写作于“985二期工程”实施之前，而在内容上符合民族宗教学的研究方向，所以也被采用了。今后我们希望这一文库能继续做下去，扩大它的容量，凡属于民族

宗教学方向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不论何校何地，均有机会进入文库，使文库成为这一领域青年博士学位论文精品汇聚的一个平台。

民族宗教学研究，其主轴是民族与宗教的互动关系，其主旨是“族教和谐，多元互补”。我们要通过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发扬民族宗教和谐的传统。我们认为，要实现民族团结、宗教和睦、民族与宗教的良性互动，关键在于确立和实践多元和谐、平等对话、共生共荣的现代文明原则，以便经过民族宗教之间的和解，达到世界的永久和平。这是民族宗教学的基本认知和宗旨所在。

青年是社会的希望，青年学者决定着学术的未来。我们从博士文库里看到了民族宗教学的光明前景。让我们热情地帮助他们，支持他们，使民族宗教学的研究事业后继有人，长盛不衰，以造福于社会和子孙后代。

中央民族大学“985二期工程”当代重大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心

“民族宗教学研究博士文库”学术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

2009年3月

目 录

绪论 “对话”时代的学术思考	001
一 “对话定义”与“时代意义”	002
二 “宗教对话”与“文明对话”	004
三 “当代对话”的重大实践课题	007
四 “池田对话”与日本当代佛教	009
第一章 池田大作：东方文明对话的先行者	012
第一节 池田大作及其对话活动	013
第二节 日本的宗教对话理论研究	016
一 20世纪后期的日本宗教对话研究	016
二 21世纪以来的日本宗教对话研究	018
第三节 中国学界池田大作思想研究现状	021
一 池田著作的大量译介	022
二 池田思想研究的兴盛	022
三 池田思想研究的特点及问题点	027
第四节 池田思想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028
第二章 池田文明对话思想的发展脉络	041
第一节 雏形期：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	042
一 国际争端与对话“斡旋论”的提出	042
二 池田“斡旋论”对话观的时代背景	044
第二节 拓展期：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	047

一	与汤因比的全面对话	048
二	文明对话“实践论”的提出	052
三	论“对话”的诸多具体问题	055
四	关于“宗教对话”的思考	057
第三节	深化期：20世纪的最后十年	057
一	关于对话本质的阐释	058
二	关于对话意义的发掘	059
三	关于对话形式的再思	060
四	关于对话态度的反省	061
五	关于对话规则的概括	062
第四节	成熟期：2000年前后的十年	064
一	池田对话思想成熟的现实与学术背景	065
二	池田文明对话思想的特色	066
三	关于池田文明对话观的几点思考	073
第三章	池田的文明对话实践	076
第一节	宏观背景与现实危机	076
一	当代物质危机与消费文明隐患	077
二	西方文明发展模式与全球生态问题	079
三	人类精神危机与现代公害难题	080
四	群体的外在张力与个体的内在混乱	082
第二节	文明对话与世界和平	084
一	反战、废核与文明对话	086
二	暴力、人权与文明对话	093
三	环境、生命与“对话”新意	106
第三节	文化对话与教育理念	114
一	从“相对主义”到“对话主义”	114
二	“东方佛学”特色的文化对话	117
三	“人间论”特色的教育对话	122

四 “世界公民”教育的时代使命	127
小 结	129
第四章 池田的宗教对话思想及其实践 131	
第一节 关于“宗教”的再思考	131
一 池田对话中的“宗教”与“人”	131
二 宗教组织的性质与教团建设发展	135
第二节 “法”与“神”:佛教与基督教的对话	139
一 “缘起”与“创世”的生命观	139
二 “利他”与“救济”的幸福观	140
三 “法”与“人格神”的信仰观	144
小 结	149
第三节 “同苦”与“和平”:佛教与伊斯兰教的对话	150
一 佛伊二教“和平对话”的共识	150
二 创教的“同苦”经历与相同的“救世”之心	153
三 广泛的社会贡献乃宗教的生命线	161
小 结	164
第四节 “人本主义”的共鸣:佛教与儒教的对话实践	165
一 “法”与“天”:拓展“人学”的宇宙论视野	166
二 “慈悲”与“仁”:促生“人与文明”的变革	168
三 “宇宙即我”与“天人合一”:“人本主义”新 高度	176
小 结	186
第五节 池田宗教对话实践的主要特征	187
第五章 池田的对话观与东方佛学智慧 193	
第一节 池田的对话观与《法华经》	193
一 《法华经》中的文明对话思想资源	194
二 池田对《法华经》的精神弘扬	202

第二节 池田的对话观与日莲思想	205
一 日莲佛教思想的特色	205
二 池田对日莲思想的弘通与实践	212
第三节 池田的对话观与创价理念	215
一 牧口常三郎的“创价教育论”	216
二 户田城圣的“佛性生命论”	217
小结：池田大作对话思想的三大佛学思想来源	219
第六章 关于池田对话思想的学理反思	222
第一节 文明对话的发展与宗教对话的转型	222
一 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文明对话	223
二 宗教对话的理论难题与现实张力	226
三 关于宗教对话转型期的理论思考	229
第二节 当代宗教对话中的“人性”问题	231
一 欧美、日本与中国的宗教对话理论研究	231
二 宗教对话理论中的“人性”问题反思	234
第三节 池田的“对话”模式与“人间论”特色	235
一 池田的“典型对话模式”	235
二 池田对话模式的“人间论”特色	238
三 池田“人间论”对话思想的东方传统	242
第四节 日本当代佛教视角下的池田对话思想评析	244
一 池田对话思想与日本新佛教的发展	245
二 池田对话思想与创价学会的现代转型	246
结论 关于“池田对话”的几点总结与反思	250
参考文献	256
后记	273

绪论 “对话”时代的学术思考

历史上，世界各大文明、宗教之间的相遇，经历了在冲突中磨合、在碰撞中反思、在接触中交流的过程。时至今日，随着人类经济的飞速发展，现代通信的日益便捷，全球一体化的浪潮推动着人类文明加速向前跃进，“地球村”里的现代人“自身”与“他者”共存的实感日益强烈，不同文明、宗教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如果说20世纪是人类在冲突、战争的阴霾下与物质至上的追寻中日渐迷失的一百年，那么，面对一个全新的时代，不同文明、宗教将以何种方式达成沟通与交流，实现和谐共生，无疑成为最具时代性的重要议题。

回首20世纪，一百年的时间里“战争”或许可以称为一大主题，人类为此付出了沉痛代价。新的千年，和平尚未成为今日世界的主旋律。局部战争与冲突仍在上演，数以万计的难民流离失所，长期陷入饥饿与贫困，恐怖事件的频发让人们在恐惧与不安之中，更加深了对和平的渴望。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速，现代社会的一体化与多元化特征愈加明显。如何正视当今世界中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不同人种、不同民族的人们在思想、宗教、文化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性，如何解决由于差异而导致的不公正，人类如何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和谐共存，这是当今时代横陈于人类面前的共同课题，丝毫不容回避。

为了避免世界性战争的爆发与历史悲剧的重现，今日世人在警醒之余亦致力于寻求一种和平、理性的方式，无论鉴于历史还是着眼未来，无论是重大问题的解决还是有限范围的磋商，“对话”都当属最本原、最人性化亦是最具可行性的方式。

一 “对话定义”与“时代意义”

何谓“对话”？这是一个有多重视角、多种界定方式且至今争议很大的问题。

本书所探讨的“对话”被置于当代宗教学研究的话语背景。事实上，文明、宗教对话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由来已久，正如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之间的相互存在与影响一样，世界历史上，每一种地域文明的形成都与诸宗教的交往与融合有密切关系。同样，文明的接触过程本身其实也是一种不断“对话”的过程。

但是，“文明对话”“宗教对话”被作为一种观念提出却是近代以来的事，且率先以基督教学者的呼吁与实践为先导。出于对上帝的虔信，基督徒始终认为耶稣是使人获得拯救的唯一出路。但在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二战结束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通信条件的改善，各地域的人们接触得越来越频繁，不同信仰者之间的相遇、交往与相互影响让众多基督教神学家意识到了其他信仰体系的存在及其传播作用，在处理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关系的理论问题上逐渐形成了回应策略，“宗教对话”的观念由此而生。

“文明”“宗教”的定义本身即很难准确界定，想要对形式多样的文明、宗教“对话”现象进行完整准确的界定很难实现。从事基督教对话神学研究的知名学者黄保罗曾在其著作《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对话神学》一书中对“宗教对话”做出了界定，即“对话是在两方或者多方之间进行的互动性交谈”，其参与者“至少应是两个宗教团体的权威代表”^①。这一定义是仅就基督教对话神学的立场、着眼于宗教对话的参与者与形式两方面内容而言的，强调了对话的团体代表性、立场性与互动性。

从近年来的宗教对话理论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已经开始思考“对话”的定义，日本学者星川启慈等还多次提出宗教对话参与者范围需拓展的问题。尤其是这半个多世纪以来，宗教对话、文明对话实践发展较快，主题和形式上都显现出灵活多样的特点。日本学界所谓“宗教对话”，主

^① 黄保罗：《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对话神学》，民族出版社，2011，第146~147页。

要涵盖三方面内容，即宗教对话、合作、交流，并将现代宗教对话大体分为四种类型，即宗教神学对话、宗教合作对话、宗教生活对话、宗教体验对话。但在本书中，笔者希望以更广域的视角来思考和看待文明、宗教的“对话”问题。

追溯人类发展史，“对话”毋庸置疑是人类交流、交往最原初的形态，每个人在进行社会生活的过程之中，都需要通过“对话”的方式达成交流与合作。若从宗教哲学意义上来说，笔者认为可从广义与狭义角度来给予定义。广义的“对话”通常指各大文明、各大宗教之间沟通、交流和交往的互动性过程，这一过程可以是代表不同文明与宗教立场的人与人之间展开的语言形式的交谈，也可以是团体之间的相互合作，由于宗教对话通常被理解为文明对话最核心的部分，因此广义上的“对话”统称文明对话。狭义的“对话”主要指代表不同宗教^①立场的双方或多方之间进行的语言性互动交流，简称“宗教对话”。当代世界宗教对话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通常以1962~1965年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召开为标志，由天主教率先发起，以基督教、天主教等西方代表性宗教为主要倡导者，得到了世界各大宗教的代表人士的响应与参与，相互围绕教理教义问题、宗教关系与发展等问题进行交流、比较与探讨。这样的“对话实践”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至今仍在继续。

21世纪翻开了人类历史的崭新篇章，“对话”成为这个时代的选择与人类发自内心的呼唤。正如法国政治学家帕斯卡尔·博尼法斯（Pascal Boniface）总结和担忧的那样，“20世纪表现为一个战争的世纪，而今天，没有任何迹象表明21世纪将是一个和平的世纪”^②。事实上，今日世界，人类科技与军事力量飞速发展的程度足以证明这样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即未来一旦爆发全球性的高科技因素参与其中的大规模战争，其后果将是灭绝性的。21世纪，人类需要携手跨入一个学会冷静反思、接纳他者、重

^① 宗教对话还可以细致分化为宗教内不同派别之间的对话与宗教间对话，本书主要以池田大作与代表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不同宗教立场人物之间展开的宗教间对话为研究对象。

^② [法]博尼法斯：《透彻分析当代世界》，许铁兵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第186~188页。

塑自我与互助合作的全新时期，而“对话”无疑是最和平、最理性、最具可行性的交往方式。

关于对话的必要性与作用问题，在日本长期开展公共哲学与对话研究的韩国学者金泰昌指出：“关于对话问题，有各种相关的讨论，也不乏诸如‘对话的力量太微弱’，‘仅凭对话能解决问题吗’之类的质疑。那么，仅凭‘暴力’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还是仅凭‘财力’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呢？的确，‘对话’不是万能的。但是，如果人的意识和体验是发展的变化的，至少相比那种依靠‘暴力’来解决的方法或者凭借‘财力’来解决的幻想，‘对话’可以凭借其不折不挠的持久力去谋求共同的协作和开拓创新，这难道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在现实中谋求改变的途径吗？”^①2001年被联合国命名为“文明对话年”，呼吁各文明、各宗教之间以相互平等、彼此尊重的姿态开展广泛、深入的“对话”。此举正是缘于这样一种共识，即“对话”，是和平的助力；“对话”，是时代的召唤。

二 “宗教对话”与“文明对话”

“对话”缘何要先以“宗教对话”“文明对话”的形式展开呢？对此，我们或许可以从如下两组统计数字中找到答案。

据1996年的不完全统计，各类宗教信徒人数约占世界人口的4/5。其中，世界三大宗教的信徒人数为：基督教徒19.55亿，占世界人口的33.7%；伊斯兰教徒11.27亿，占世界人口的19.4%；佛教徒3.11亿，占世界人口的6%。其他传统宗教的信徒人数占前几位的是：印度教徒7.93亿；犹太教徒1385.8万；锡克教徒约1700万。另外，各类新兴宗教信徒1.23亿。^②

估算至2001年，世界人口约61.28亿，其中基督教徒20.24亿，伊斯兰教徒12.13亿，佛教徒3.63亿，印度教徒8.23亿，犹太教徒

① 稲垣久和、金泰昌编著『公共哲学——宗教から考える公共性』，第Ⅲ期，全5卷，東京大学出版会，2006，117ページ。

② 参见任继愈主编《宗教大辞典》绪论，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第11页。

1455.2万，锡克教徒约2368万，各类新兴宗教信徒1.03亿。^①

出于数据的可靠性与参照性的考虑，此处选取了两组略有时差且来源不同的数据，从其统计结果来看，全世界信仰人数约占全球总人口的80%，^②这一比率两组统计基本吻合，也充分说明了宗教对当今人类生活重大影响。换言之，当今世界人类的“对话”，是不同的信仰状况与生存方式的人们之间的“对话”。这也有待唤起我们对于“宗教对话”之重大社会意义的深刻反思。正如宗教学者麦克斯·缪勒的名句所言，“只知其一，一无所知”。不同宗教的对话，能够让更多的宗教信徒不再囿于自身的信仰世界，能够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在自身的信仰体系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异质的信仰体系存在，并且尝试在与他宗教的信徒交流、交往的过程中更加理性地反观自身，更深入地理解自身的宗教与信仰。关于“宗教对话”及其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最具代表性与震撼力的评述当属当代著名天主教神哲学家、《走向全球伦理宣言》的起草者孔汉思的总结发言：

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就没有民族、国家乃至文明之间的和平；
没有宗教之间的对话，就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
没有宗教研究，就没有宗教之间的对话。^③

在此基础上，人们难免进一步思考：“宗教对话”与“文明对话”又有怎样的关系呢？如上所述，在21世纪的今日世界，“对话”已经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流行语。“宗教对话”是国际宗教学界的一个重大课题，一个前沿领域。伴随着宗教对话实践的开展，世界各大文明之间如何更好地交流、交往与对话，即如何拓展“文明对话”问题也成为备受瞩目的关键

^① 《国际宣教研究学报》(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2001-1。

^② 张志刚：《宗教学前沿问题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2014，第111页。

^③ マジッド・チヘラニアン/デイビッド・W・チャペル編『文明間の対話』、潮出版社、2004、前書き1~2頁。

议题。关于“宗教对话”与“文明对话”的关系问题，从前期研究成果来看，或许由于两者内涵与外延的交集过于重叠、宽泛、难以界定，学者们或选择从宗教学、哲学视角单纯进行关于宗教对话理论的论证与思辨，或倾向于围绕文明对话的作用、意义及未来发展问题展开理论性分析，就目前笔者所涉猎的资料，尚未对二者关系展开深入思考与论证。

事实上，在宗教对话与文明对话关系问题上，较有特色的见解当属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塞缪尔·P. 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论述。亨廷顿认为，当今世界是“一个由七八种文明构成的世界”，“超级大国竞争”已被“文明的冲突”所取代，“宗教是划分文明的主要根据”，“宗教信仰是区分文明的主要特征”^①，宗教可以视作“人与人之间的最根本的差异”^②。此外，宗教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 1889—1970）也曾指出，“伟大的宗教乃是伟大的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也曾对五大世界宗教进行过考察，其结论证明，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与儒教都是与现存的一种主要文明相结合的。^③

如上，引申至“宗教对话”与“文明对话”的关系问题，我们不难推论，宗教对话是文明对话最核心、最具代表性，也是难度最大的内容。如果我们回顾开展了半个多世纪的宗教对话史，面对宗教对话实践中不断凸显的各种困惑与难题，太多事实让我们不得不深刻反思宗教因素的积淀性、弥漫性、渗透性与深层性问题。无论是领土争端、资源争夺、和平安全、政治利益，还是意识形态、信仰习俗、种族或民族矛盾等，宗教因素深藏与纠葛于文明冲突的各种表象之中。正如我国宗教学学者北京大学张志刚教授所指出的，或许那种“文明冲突论”中过分夸大宗教因素之影响力的“宗教决定论”有一定的武断性^④，但宗教因素的影响绝不可轻视，这是毋庸置疑的。

① [美]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24~25页。

② [美]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85页。

③ 关于佛教未能与某种代表性文明相结合的原因，韦伯分析其原因在于主要是因为佛教融入了其他文化，因而没能构成某种现存的主要文明的基础。

④ 张志刚等著《当代宗教冲突与对话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第181~184页。